

何祚庥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HEZUOXIU LUN
MAKESIZHUYI JINGJIXUE

何祚庥 著
庆承瑞 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何祚庥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HEZUOXIU LUN
MAKESIZHUYI JINGJIXUE

何祚庥 著
庆承瑞 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祚庥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何祚庥著;庆承瑞编.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 10

ISBN 978 - 7 - 5638 - 2524 - 0

I. ①何… II. ①何… ②庆… III. 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IV. ①F0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3602 号

何祚庥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何祚庥 著 庆承瑞 编

责任编辑 曾三林

封面设计



砚祥志远·激光照排

TEL: 010-65976003

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邮编 100026)

电 话 (010)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传真)

网 址 <http://www.sjmcb.com>

E-mail publish@cueb.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服务部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510 千字

印 张 29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38 - 2524 - 0/F · 1421

定 价 78.00 元

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必须深入改革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代前言)

何祚庥

一、这是一个有重大争议但又必须深入研究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1. 这篇《必须深入改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的文稿,原是提交给2015年10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讲话稿,后来又先后分别在成都和开封两次大型政治经济学研讨会上提出讨论,并在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南科大讲堂与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做过较详细的介绍。而在2015年11月10日,各大网站纷纷刊出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同志特别讲到“要发挥改革的突破性和先导性作用,增强改革创新精神……依靠改革为科学发展提供持续动力”。(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近读2015年12月23日习近平同志讲话,看到他又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中特别谈到,“列宁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事实,而不是教条’”,又说:“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这就促使我们更加感到迫切需要解决本文标题所说的这一有重大争议的重大理论问题。

2. 但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如毛泽东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却大多只会“言必称希腊”,而且“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毛泽东还具体批评某位黄姓“经

^{*} 本文新近发表于《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年31卷第8期,发表时的标题为《必须用时代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①。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也一直组织各级干部、学者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由于改革开放前一直推行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未能持续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政策,因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中,上述教条式的“言必称希腊”的学风,其实并未根本转变。

为什么习近平同志在这里特别强调要“依靠改革”?因为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有重大争议的,但又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而产生这一重大纷争的原因,在于有相当一些学者深受教条主义束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需要有重大发展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已经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做的重大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历史意义、历史地位理解估计不足,有些人甚而认为邓小平完全否定、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十八届五中全会新提出四个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而排在“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前面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都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为理论基础。由此可见,增强和依靠改革,深入改革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必须要解决、推进和付诸实施的重大措施。

二、具有历史意义的两个“邓小平之问”之一:什么叫马克思主义?

1.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当然是为了服务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早在1979年3月30日中央召开的为推进改革开放的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做了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②。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又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讲话中,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两个坚持,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分重要”,提出下列两大“历史之问”:

“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而“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③。

而较为清醒一些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在于发展生产力”^④。(以上着重号均为引用者所加)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56页。

②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③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④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我们非常有兴趣,而且必须要深入探讨的是,为什么1984年邓小平会提出这两个“历史之问”,而且竟然首先回答:什么叫马克思主义?

也许首先令人感兴趣的,是邓小平这里所说的“认识不够清醒”的“我们”是谁?不用说,这当然包括我们这些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才接触或学习到马克思主义的“后辈”,但更重要的,是指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些“前辈”马克思主义者。

为什么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参加多年革命斗争之后,竟然会提出“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疑问?而且认为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我们”,对这个重大“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当然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发展道路正面临重大转折。而这一重大转折之所以出现,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不无关系。

这里需要略微补充一下,这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这样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早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提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而我们“要来一个完全彻底的马克思主义”^①。

而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竟做了一个明确的回答,“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亦即并不是最注重阶级斗争!实际上,这涉及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个从来没有明确回答和解决的根本理论问题,这就是:什么是推动历史社会前进的动力?是生产力还是阶级斗争?

前辈哲学家吴江同志去世前不久曾约我到他家中,“深入讨论”若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问题。他给过我一篇他晚年写的《论历史的动力》的理论文章。他告诉我,早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早期,“在历史发展动因这个问题上,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早就有两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观点存在着:一种着重于阶级斗争,一种着重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这两种不同的观点(乃至由此形成的不同的立场)直接影响到一个革命政党对于斗争形势的估计和策略的制定,政党之间或政党内部的许多纷争由此引起。例如,对于十月革命的评价,对‘左’的空想共产主义行动的批评等。当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一开始就表现出这种分歧,拿李大钊在1919年5月所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做例子,这篇文章第七章的第七节有这样一段话:‘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而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的原动力为生产力,

^①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332页。

一面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可以由此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一方又说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①

现在已到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为上述“争议”做结论的时代了。应该明确——这也是邓小平的回答: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社会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决定着阶级斗争,决定着社会进化发展的方向;阶级斗争,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即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时,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而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不能不牵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坦率地说,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都是阶级斗争学说强烈的信奉者、支持者。青年时代的何祚麻等人,之所以决心参加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列,就是因为早年读到马克思于1867年在《资本论》第1卷里所写的如下字句:“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而现在却要转到“社会生产力是决定历史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这就不能不质疑:《共产党宣言》所强调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学说是否十分正确?如果思考得再深入一些,就还要进一步提问: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阐述的劳动价值论,以及相关的剩余价值学说,是否还正确?这些,都是要深入改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所不能不科学地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

2. 但我们也必须冷静地看到,实践是检验客观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劳动价值论其实是以许多重大的历史的社会实践,奠定其科学基础的。劳动价值论在解释社会历史经济重大变动发展的动因问题上,有一个重大的成就,即认为“社会平均简单必要劳动”是人类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而因此,判断一个社会是进步还是倒退,就要考察某个社会究竟投入的“社会平均简单必要劳动”有多少,所创造的“价值”又有多少。而大体上说,某个社会所能投入的“社会平均简单必要劳动”虽然会随着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体制而有所差别,在总体上,却总是和人口总量成正比。因而,判断某一国家或社会是前进还是倒退,往往首先考察所拥有的人口总数是增加还是减少。或者说,按照劳动价值论,某个国家或社会的总产值,

^① 吴江:《吴江文稿》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155页。

将大体上和总人口成正比。

而这一点,却完全得到中国以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历史事实的证实。

林毅夫在其所著《解读中国经济》一书中,曾给出美国哈佛大学珀金斯所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一书所述“从明朝开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农业发展情况的一项研究:‘他从中国2 000多本县志中,把各种有关生产、人口的数据逐一予以统计,然后拼成一幅完整的图像。根据他的研究,在1368~1968年这600年当中,中国的人口增加了10倍,耕地面积增加了5倍,单产增加了2倍。由此算出,粮食增产10倍,但是人均粮食产量却维持不变。’”^①当然,类似的统计数据还有很多。

这就是说,在人类早期社会中,国家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主要依赖于人口的增长。人口增长所带来的人均产量的增加,亦即劳动生产率,却长期维持不变。而一旦出现了“水旱黄汤”等天灾人祸,就必然导致人口数量的下降,以减少对粮食的需求。这类由社会经济许多统计数据所提供的显然的证据,可以说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强烈的支持。

在中国共产党人所推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剩余价值论以及相应的阶级斗争学说,也得到了很好的检验和证实。1948年年初,我曾有机会“参观”在冀中地区推行的土地改革运动,曾仔细学习过《在农村中如何划分阶级》这份内部文件。正是这一文件运用剩余价值学说,具体给出了如何计算剥削量,如何计算各不同阶级、家庭以及个人所占有的剥削份额的许多规定;正是这一文件帮助土改工作者正确地区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读到这一文件之后,我对于马克思发明的剩余价值论,以及由此而来的阶级斗争学说,真是倾倒佩服之至!从而也就使我完全确立了中国必须走革命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3. 问题是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阶级斗争学说被移用于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这就不得不提出尖锐的问题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由此产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经济,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毛病?”^②

这就不可避免地提出一个必须明确回答或科学总结的重大理论问题。阶级斗争以及剩余价值的理论、学说是否还正确?或是否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如革命时期才正确?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理论就变得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

①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7~278页。

② 何祚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与时俱进”》(上),《学术界》,2013年第7期。

当然,也会有人认为,这不是理论的不正确,而是运用和解读得不正确。在土改时期,人们曾运用劳动价值论对剥削份额做了许多定量计算,而后来要打倒“走资派”时,却全然未见到这种定量的分析。

痛定思痛!这就必须有一个对生产力和阶级斗争相互关系的完整的、科学的分析。

三、为什么邓小平还提出“历史之问”之二:什么叫社会主义?

1. 对于第二个问题——“什么叫社会主义”,邓小平也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这就是“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而传统的理念是: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消灭资本所带来的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私有制,建立由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全民所有制等公有制的社会制度。

然而邓小平竟然将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又一次规定为“发展生产力”,亦即仍然不是阶级斗争!这是为什么?

邓小平的回答是:“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最后又说,“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②后来又加了一句话:“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③理由是: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④,否则就不能说“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出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对”^⑤。(以上着重号均为引用者所加)

后来,到了1992年,邓小平又提出一个著名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⑥或者说,在何谓“本质”的问题上,仍然没有提到所有制。从邓小平来看,更重要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取代资本主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②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4页。

③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④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⑤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⑥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义,归根到底,取决于“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①。

2. 那么,当代中国将怎样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

邓小平也做出了回答:

第一,“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②。

第二,“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九十年代,进步得更快。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③。(以上着重号均为引用者所加)

现在发生重大争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能否“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和“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而其中最为重要,而且引起巨大争议的是,在体制改革上,能否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经济体制,包括市场经济以及它们推行的计划控制等“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一个显然的疑惑是,这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复辟?

有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讥讽小平同志为眼光短浅的“不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者”!是邓小平忙于“救急”,不顾“长远”。然而这大错特错!原因在于,这些“学者”根本就没有弄清楚为什么邓小平多次谈到,“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④。(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

那么,我们应怎样从理论上搞懂、搞清楚邓小平的这些论述?

① 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7页。

②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③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378页。

④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页。

在我看来,首先是必须从理论上真正搞懂、搞清楚,为什么当代已相当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将来必定会走上小平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首先是必须真正搞懂、搞清楚,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其中“生产的社会性”又是基本矛盾中起主导作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

需要看到的是,现代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之一,就是生产力将持续不断地愈来愈走向社会化的分工和协作,其社会分工将越来越细,其协作范围将越来越广。或者说,生产力的社会化自身及其所使用的“手段”,也具有社会主义的特性和本性。生产力自身所具有的社会主义的特性或本性,正是决定着人类社会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根据。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4篇中讨论个体生产演变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过程做了如下描述:“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以前,即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城市的手工业。劳动资料——土地、农具、作坊、手工业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也照例是属于生产者自己的。”“但是,正如马克思在那里所证明的,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纺纱机、机动织布机和蒸汽锤代替了纺车、手工织布机和手工锻锤;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厂代替了小作坊。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现在工厂所出产的纱、布、金属制品,都是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都必须顺次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才变为成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①

问题是,“从前,劳动资料的占有者,占有……他自己的产品”,而“现在由社会化劳动所生产的产品……而是为资本家所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化的了。但是,它们……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生产方式虽然已经消灭了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们仍然服从于这一占有形式”^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8~3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0~311页。

正是这一“社会化劳动”，或“生产资料和生产……社会化”的事实，决定了人类社会必然要冲破“占有的私人性”带来的种种消极面，也决定了人类社会必然要走上适应于这类社会化的生产力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从邓小平来看，“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而“马克思主义（也就）最注重发展生产力”^①。

3. 问题是，现代的社会化大生产，其社会化程度早已超越了生产成品是某个工厂、某个企业的“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现代化的许多生产成品，甚至是远隔重洋，超越某个地区、某个国家、某个民族，超越某大洲的地理区划，并由多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等各种生产要素的协作、组合而成的“共同产品”。世界经济，也就是社会化的生产力，正通过不断发展中的各种“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科技市场，文化、教育、卫生等市场，而联结起来，组织起来，构建历史上空前的超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大生产；其中，“市场”是现代社会化生产力走向全球化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中介。

而邓小平却比我们想得远为深入。邓小平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②他还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③（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

从我们来看，这是邓小平对市场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位和作用做了根本性的颠覆！也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所做的重大发展！

这也就是说，在邓小平看来，市场和科学技术一样，都是价值中性的。它们都只是“手段”，目的在于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也和科学技术一样，既有被私人性所占有的一面，同时也有服务于社会化的一面。所以，市场经济并不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样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所以，早在1979年之初，邓小平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而江泽民在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也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④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②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

③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④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

胡锦涛在总结改革开放 30 年的经验时也说：“必须坚持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①显然，市场经济是完全可以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一种经济体制；而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要综合地利用市场和计划这两种手段，促进这种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生产力。

4. 可以说，邓小平所提出的两个“历史之问”，一举突破了某些人以生产关系发展的顺序作为判断社会历史是前进还是后退的所谓的“生产关系标准”。而事实是，在当今社会，人们大多公认的是用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是发达还是落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高还是中、低，作为判断其发展阶段的标准。

而这样一来，是否妨碍人们走向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都认为，所有制形式决定着分配形式。而世界各国的事实表明，收入分配水平的高低及其差别，首先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谓库兹涅茨曲线，就鲜明地刻画出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这一基本特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制对分配没有影响或毫无作为。在《21 世纪的资本论》一书里，作者皮凯蒂就以丰富的数据，表明在某些国家库兹涅茨曲线的延伸又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皮凯蒂也给出：中国等一些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即使其中的某些国家推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国家中的贫富差别，甚而较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大！这也在一个侧面说明，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其分配问题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所有制，亦即不是仅由阶级斗争所单独决定！而如果把“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斗争仅仅看成是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争夺，就是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化了。

5. 至于判断某个国家（或社会）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我更赞成列宁说过的“共产主义即苏维埃加电气化”的经典论述，也赞成王震将军在仔细参观过英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后所说的一番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失，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到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②而判断当今中国是姓“资”还是姓“社”，“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③。（以上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所以，我坚决拥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而“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 年 10 月 15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0 页。

② 科斯：《变革中国》，徐尧、李哲民译，中信出版社，2013 年版，第 209 页。

③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73 页。

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①。当然,这就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辩证关系。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毫无疑义,仍伴随着不同利益集团间的争夺和冲突,而某些冲突甚而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某些新自由主义学者和“左”派教条主义学者的错误,就在于或者否认或者夸大这种争夺和冲突。而重要的是,要将这种争夺和冲突服从于促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广大人民群众更需要的是合作、互利和双赢。

把建成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想得太简单了,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就指出:“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那些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②

所以,是否真的认同,即不是口头认同邓小平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区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分界线。

6. 所以,对中国发展路线的探索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不仅要“吸收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而且还要学习和借鉴其中“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理论、理念、概念,包括它们用以研究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也就是说,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走向这一新的探索之路。只有走出一条“新路”,才能真正回答并解决面临的重大理论创新、制度创新问题。

而所谓新路,也就是邓小平所反复指出的:“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但邓小平又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③“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④(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

毫无疑义,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改革也就不可避免地正面临着新路、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6页。

③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370页。

④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老路、邪路三种发展路线的不同理念之争。这是我们推进如何深入改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这一事业第一需要深入反思的大前提！

四、“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表现”。这一“第一”或“先进”的形容词，并不是可有可无

1. 需要进一步详加讨论的是，为什么小平同志再三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过去，我们从来仅只强调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现在又加上了“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小平同志鲜明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①，而江泽民同志更认为“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②。（以上着重号均为引用者所加）这首先是因为“近一二十年来，……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③。举例来说，在半导体工业中，就涌现出所谓 CPU（中央处理器）成本每 18 个月即下降一半的摩尔定律。而这些新出现的快速增长的许多事实，仅用劳动价值论将完全无法做出解释。所以，邓小平和江泽民在这里新添加的“第一”和“先进”等形容词，其实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2. 而新出现的问题是，人类正面临新的重大技术革命，有些朋友称之为“第三次”或“第四次”技术革命。新出现的重大技术革命包括：

（1）出现了可再生能源的革命。人类将不再需要消耗存在于地球上的包括核能在内的化石能源；人类只要做出长寿命的能持续转化能量的装置，如长江三峡的大坝积蓄的水能，就是从太阳能获得的持续发展的动力。这也就是“万物生长靠太阳”，或者如普里戈津所说，“要输入外熵”。

据我们所知，太阳的生存寿命将至少是 40 亿年。仅中国的大陆地面年接受的太阳能总能量便是中国年消耗的一次能源的 500 倍！加上我国拥有的海洋上的太阳能，还能再增加 200 倍！而地球上拥有的核能，包括海水中的氘却最多只能支持人类持续利用几千万年！可再生能源的出现，事实上让人类拥有了不再需要消耗地球能源的“永动机”。

可再生能源的出现，也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革命性的根本的转变。恩格斯曾说，如果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用它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改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74～276 页。

②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75 页。

③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77 页。

变;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然而,也正如恩格斯所强调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①。(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例如,化石能源的燃烧,会造成 CO₂ 以及雾霾对人类的污染;而核能的开掘,更可能造成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至少长达 10 万年以上甚而达 100 万年之久的重大核事故!但是,可再生能源的出现,却在能源问题上完全改变了“自然界对我们进行报复”的关系,人类将从太阳能及其衍生的风能、水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

而一旦有了“持续发展的动力”,就还能利用这种能源进一步解决人类可能面临的资源短缺问题。这时,人们将能利用太阳能来实现物质的循环利用,也就是实现人类的伟大梦想——实现循环经济。

(2) 同样重要的是,正在迅速发展中的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互联网+……”将极大地扩大市场需求,推动市场的创新和革新。日本的马桶盖,实在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技术发明;但从市场需求来看,有了“互联网+马桶盖”,就成为一种很重要的市场创新。而如果将这一思维模式推广到社会生活各领域,那么,“互联网+……”就能大大激活市场的潜力,激发出许多科学创新和市场创新模式。

马云所创造的阿里巴巴的营销模式,只不过是“互联网+电动自行车改装的电动三轮车+……”。从车辆技术来说,中国人发明的电动自行车并不属于重大科技创新,但却满足了当前中国市场的需要。而一旦有了“互联网+电动三轮车+各种各样的生产用品和生活用品”,就将极大地冲击传统的商业模式。首先是“超级市场”的营销模式。其中,“互联网+……”将导致单位商品的交易成本持续地大幅度下降,也不排除交易成本中的活劳动将会趋向于零!

如果的确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将真正实现那位百岁经济学家科斯的设想:“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产权或所有制的区别将不再是重要的。”或者说,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市场进步,以及交易成本的持续下降,将极大地缓解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争夺和冲突。

(3) 21 世纪新出现的最为重要的技术——机器人的革命。机器人将完全包揽“社会平均简单必要劳动”,包括工人、农民、店员、服务员等从事的各种体力劳动。

机器人每天可工作 24 小时,可不畏严寒酷暑,可在空中、水下等缺氧、缺少生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于光远等译编,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 304~305 页。

存条件的环境中连续工作,也不需要寒假、暑假、产假等假期。

机器人也能取代教师讲课,取代科研人员整理数据、大量实验等重复性的脑力劳动,甚而还能取代新闻记者排版面、写新闻,特别是撰写《人民日报》一类报纸所需的新闻,可以做到又快又好,而且绝对不会出现政治错误!可以说,现代机器人,特别是具有学习功能的智能化的机器人,将全面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一场机器人改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时代正向我们走来。

机器人也将深刻地改变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当前中国发展的“短板”之一,是农业生产技术特别落后,农业劳动生产率特别低下。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较小,因而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占用了大量的农村人口,其总人数高达7亿。如何将如此庞大的农业人口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是一个特别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智能机器人可以每天工作24小时,将完全、彻底地改变农业的作业模式。这里有行走系列的机器人,如自行走动的耕作机器人、施肥机器人、除草机器人、喷雾机器人、嫁接机器人、采摘机器人、育苗机器人、育种机器人……各种花色品种。而机器人运作的、由拖拉机驱动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已是完全成熟的技术。对畜牧业,也有了剪羊毛机器人、挤牛奶机器人、放牧机器人等花色品种。

非常值得参照的,是日本发展的机器人技术。日本是农业机器人研究最早、市场发育最为成熟的国家之一。目前,日本已研制出育苗机器人、扦插机器人、嫁接机器人、番茄采摘机器人、葡萄采摘机器人、黄瓜采摘机器人、农药喷洒机器人、施肥机器人和移栽机器人等多种农业生产机器人。日本在机器人理论与应用方面都居世界前列。

德国的农业专家还采用计算机、全球定位系统(GPS),直接指挥在大田作业的机器人。现正谋求将这套技术通过卫星实现跨国指挥,在别的国家的土地上耕作。中国正在和德国协商如何开展合作,在中国使用这套指挥技术,推进中国农业的现代化。

中国是一个拥有13.5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农业落后一直是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短板”。从现在的发展来看,中国的农业必将陆续走向“温室农业或植物工厂+机器人运转、操作、控制”的道路,而这将解放出大批农业人口,加速改变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面貌。

3. 上述三大技术革命其实是人类的双手、语言 and 大脑还有心脏功能的延伸。而“机器人+互联网+可再生能源”的綜合的发展,必然冲击人类社会经济、政治甚而还影响到文化发展的面貌。

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这一革命带来的重大后果是:由“机器人+互联网+